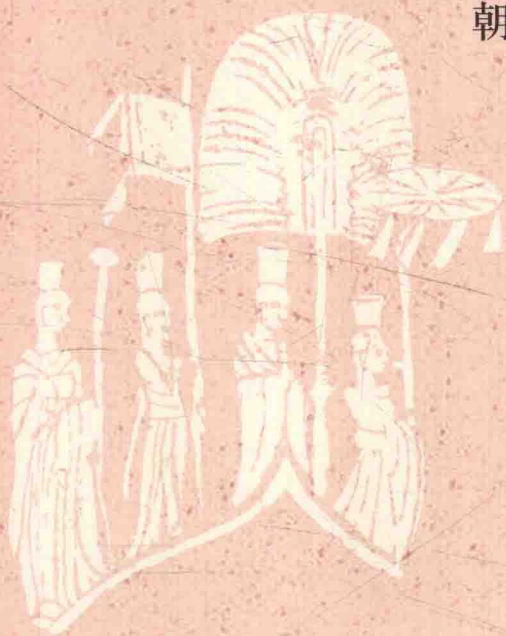


大家说历史

群雄纷争 频繁更迭

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

朱大渭 著
戴卫红 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大家说历史

群雄纷争 频繁更迭

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

朱大渭 著
戴卫红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雄纷争 频繁更迭: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朱大渭著;
戴卫红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9

(大家说历史)

ISBN 978-7-108-06219-2

I. ①群… II. ①朱… ②戴… III. ①中国历史-魏
晋南北朝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K23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2237 号

责任编辑 韩瑞华

封面设计 陈乃馨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毫米×900 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 数 17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治史者应不懈地追求 “德、才、识、学”完美统一

——朱大渭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风格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光辉灿烂,文献记载既连续又极其丰富,我们在研究历史科学时,要在五千年浩如烟海的地上和地下各种文献与文物资料(其中包括甲骨和金文、敦煌资料、简帛文书)以及前人研究成果三者收集整理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史观核心原则为指导,除吸收当今国外如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学以及其他历史学派某些进步的史学观点外,尤其要吸取我们民族的历史智慧,提炼我们民族的历史经验,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揭示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特征,并具体地解决我国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使唯物史观中国化,从而发展和创新唯物史观理论。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必须从本国古典史学理论层面中寻找结合点。

我国古典史学观点内涵复杂,综合概略地说来,大致可考虑和重视下列内容:“天人合一”历史发展观,史学理论不断发展观,政治经济统一而后者为基础的历史观,历史经验教训借鉴观,“以人为本”历史观,正义历史观,民族精神历史观,教化功能历史观,“用夏变夷”历史观,治史方法实证论,史家应该具有德才学识的观点。综观我国古典史学的观点和方法,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主要因时代条件和科技发展水平)揭示出历史发展系统性的整体客观规律,但从这十一条史学观点和方法论中,我

们可以看到有的与辩证唯物史观的个别观点或许有相同点,如主张史学理论不断发展的观点认为,史学理论不是固定僵死的,而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发展变化。总之,我们在治史实践中,应当树立一种大师级的弘毅精神,充分发挥自己睿智,整体透彻领悟中国历史,自觉致力于中华五千年史的大格局及其规律之构建与准确把握。这就需要在辩证唯物史观总体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把上述中国古典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包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之相融合,推进唯物史观的中国化,这是深入探索辩证唯物史观创新的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在这种中国化的辩证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才能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内容的新史学,即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地理环境,以及历代中外文化交流等整体结构体系的中国各代断代史、各种专史以及中华五千年通史。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其整体结构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推进历史的矛盾发展,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及其庞大的上层建筑所形成的各类社会形态的类型及相互更替关系,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结构特征,上层建筑中各代国家政权、法律、行政机制的运转,以及各类文化与各社会形态的相互关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杰出历史人物推进历史进程的辩证关系,等等,都具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特征,迥然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虽说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历史特征必然包含世界历史进程的某些共性,但这种共性是通过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个性特征中某些内涵去体现的。

而中国历史新史学理论及其历史的整体结构体系一旦真正建立后,就必然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有所补充、丰富和深化,甚至有所创新。在辩证唯物史观中国化治史实践中,最为关键的有两点:第一,只能将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导和引领,绝不

能把它视为封闭僵化的绝对真理,用它去套中国历史,或者削足适履地剪裁中国历史去比附唯物史观理论或其中的个别观点。必须以中国历史的时间、地点、条件为依据,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去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特有的客观规律,从而建构起中国新史学理论和历史实体的完整体系。第二,必须发挥史家的创新精神。应当在继承老一代学者学术成就(包括运用唯物史观经验)的基础上前进,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都有一种必然的传承性,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而创新又是最好的继承。我们要尽量吸取老一代学者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治史的真知灼见。在运用其基本观点和方法时,紧紧抓住中国历史实际,一切从中国历史的特征出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社会的完整体系。还应该强调,在唯物史观中国化过程中,必须不断地调整新史学的研究方向,扩充史学实体的新领域,提升中外史学交流和社会致用的价值功能。同时,还应当注意在研究内容上要使史学与其他多学科互相渗透,注意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研究成果的信息化,使新史学理论与新史学实体更具有时代精神。

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时,首先要认识史学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在史学研究中,无论是继承创新还是原始创新,都必须有个前提,即真正掌握好地上文献资料、地下文物考古资料、一千多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资料,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掌握准确可靠的资料。有了这个基础工作,才能进一步探索历史社会各领域的真实内容和客观规律。揭示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是真正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响亮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

里所谓“古今之变”和“兴坏之理”，就是指历史发展规律。司马光讲“资治”“通鉴”，也是指用历史发展的经验和规律来指导君主和封建政权的治国实践。这些古典史家和学者的观点，无疑是很卓越的，它对我国古典史学起着积极的影响。但他们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时代条件的局限，不可能真正揭示出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今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突飞猛进，各个历史研究领域又大为拓宽，这使治史者有可能做到科学地阐述历史现象的内在实质，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知道，即便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历史，要精审地解决历史上和文献中的众多疑难之点，也要求对全部有关资料做汰伪存真的清理，做精辟入微的考证，才能求得可靠的结论。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顾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约举有三：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在“博证”中说：“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探索历史规律，当然比单纯考证个别历史事件要复杂困难得多。实际上，在历史研究中，考证与论述、微观与宏观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微观研究能为宏观研究奠定基础，而宏观研究又可以带动和提升微观研究。初治史者，尤其要重视考证和微观研究，因为史学实证性极强，历史研究的正确结论是要在充分掌握和准确解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再经过理论分析，而抽象升华出来的。专著和论文中的上乘之作总是史实考证严谨、理论分析精审与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三者的完美结合。

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才、学、识”，即所谓的“史才三长”说。元代文坛“四杰”之一的历史学家揭傒斯在任修辽、金、宋三史总裁官时，针对当时学者争正统而互相攻讦的

现象,提出了“修史之德”的“心术”主张。他认为修史“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他毅然“以笔削为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辩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清代章学诚继承揭氏主张,在《文史通义》中专列《史德》一篇,明确提出“史德”观点,并做了理论上的界定。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章氏正式提出心术即史家的道德品质,这是指史家从事史学研究的主观意图及动机和目的。史家必须心术纯正,才能具有治史的职业道德。这里的“史德”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古典史家主张的秉笔直书,善恶实录,此乃求真务实意识;一是指史家学风严谨,要沉下心来,花深功夫,下大力气,对一切历史事件、制度、人物的阐述评论“律以是非之公”“以求归于至当”。由此,提出真知灼见,寻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应当说,德、才、学、识乃是对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包括史学)基本素质的全面要求,其中“德”应是史家的灵魂。所以章氏在《史德》篇中反复强调,如果史家没有“史德”,即便再有才、学、识,也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

朱先生常告诫晚辈:史学创新,特别是第一流的创新,不仅需要“才、识、学”史学三长,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一个明智史家的人生哲理,就是要不断奋发地探求历史客观规律,勇于史学创新。人类社会就是在追求真理中不断地创新而推进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这也正是朱先生五十多年在史学研究中的深刻体验和理性认识。他在主编每部论著时,不仅制定撰写指导思想和内容结构,还亲自参加各卷章节安排。在审阅

书稿时,有时会亲自动笔修改,若有疑难,或与作者反复商讨,或听取有关名家意见,其治学态度,可谓一丝不苟。

朱大渭先生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的五十多年间,兢兢业业,建树甚多,极受学界尊重。先生在其专著《六朝史论》《六朝史论续编》中,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学风严谨,实证性突出,升华出的观点,常以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物相结合,用多重论证法,因而论据充分,论证缜密,说服力极强。在探究历史制度和历史事件时,先生以深厚的史学功底,高屋建瓴,上溯先秦、秦汉,下贯唐宋、明清,因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度事件有深邃的透视与理解。因此,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学术界只知道朱大渭先生精治汉唐历史,实际上他对中国史各个方面均有深厚的修养。”在具体论证史实时,先生不仅发扬乾嘉学派考证求实的优良传统,还吸取西方史学学者的计量学方法,其论著中有大量丰富准确的统计数据,供其论见或成定论,或为一家之言。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先生更严格做到求真务实。王敏铨先生在《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中认为,三十多年来,出版的文章和论文集,最多的莫过于中国农民战争史和资本主义萌芽。这两个课题的研究有几个方面欠实事求是。“民逃,为逃役耳。”(明宣宗)过去我们的史学界不大注意这一点,也可以说有意无意地躲避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一点在农民战争史上正是关键性的一点。朱大渭在《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的《绪论》中说“几乎所有大规模农民起义都与徭役有关”,这话不仅合乎魏晋南北朝的实际,也能印证其他时期农民战争的原因。这正是王先生对朱大渭先生治史求真务实精神的肯定。在2000年11月6日周一良先生给朱大渭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收到大作《六朝史论》,不胜感谢。政治经济史之外,尊著注重论述各种制度及

社会习俗,别出心裁,补各家之不足,佩服佩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牟发松指出:“《六朝史论》作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魏晋南北朝研究者的优秀代表,……如果将《六朝史论》视为这一代研究者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似不为过。”日本大阪府立大学教授中村圭尔在评价《六朝史论》一书时说:“本书是一本真正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集,内容非常丰富,其成果兼具有广度和深度而又创新的鲜明特色。兼备独自特色和重要成果,可以把它视为新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又一新的里程碑。”最近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孔毅在《旧学邃密新知深沉——朱大渭学术成就评析》一文中,对朱先生新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后说,以往中外学者对朱先生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从新作来看也是公允而符合实际的。并进一步指出,朱先生在新作中特别强调:“当前要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就必须倡导唯物史观中国化,推进历史科学体系和观点的创新,从而构建中国新史学理论。”同时对唯物史观中国化,从深层次做了全面的论述,这是从当前史学理论发展复杂的形势提出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论述,它将对对中国史研究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魏晋南北朝研究者的优秀代表,朱大渭先生强调作为治史者,应不懈地追求“德、才、识、学”完美统一。在五十多年的治学历程中,先生也正是以此自励,以其主要论著证实了他不懈地追求治史理念的执着精神,为后学树立了榜样。

(戴卫红)

目 录

总 说	典型的封建自然经济	3
	不断更迭的封建王朝	6
	汹涌的民族融合浪潮	17
	开放融合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20
分 说	经济	29
	魏晋封建论说	29
	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	33
	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消长揭秘	41
	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	49
	政治	58
	魏晋南北朝政界名人成才年龄结构	58
	两晋南北朝官员的俸制和致仕	63
	南北朝时期豪强首帅兴起与政局变迁	78
	魏晋南北朝基层政权组织	91
	军事	97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特征	97
	水军和骑兵的大发展	104
	套城和长城的防御体系	113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	122
	夷陵之战与《隆中对》	127
	人物	134
	贤相诸葛亮	134

千古名将关羽	144
谢安的政治军事功业	151
南朝历史的开创者刘裕	158
杰出的革新家魏孝文帝元宏	164
民族	170
儒家民族观	170
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的趋同性	173
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总人口数考	179
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的深远影响	187
南方蛮、俚、僚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	190
社会、文化、科技	199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199
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	209
中古宗族组织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213
麻沸散的发明与外科大型手术	219
古代“机器木人”的始创和机制	223

附 录

朱大渭先生个人主要论著目录	229
---------------	-----

总 说



典
型
的
封
建
自
然
经
济

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各地军阀和豪强地主势力相结合而形成的许多军事集团,互相混战,迄至隋统一南北,战乱分裂局势约延续了四百年。由于长期分裂割据、朝代更迭频繁,汉族封建统治者和少数民族首领为夺取统治权而互相残杀,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北魏统一以前,北方历次战乱破坏性极大,天灾人祸,造成我国历史上人民空前的流离转徙与大量死亡,饥民遍野,饿殍满道。从全国户口升降来看,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户1600万以上,口5000万以上。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户245万余,口1616万余。经过一百多年,户口不但没有增多,反而减少了三分之二。当然,户口如此锐减,与门阀豪强地主依附人口增多以及大量逃亡有关,但从历史实际看,这只是一种因素。直至隋统一后的大业二年(606年),有户890万余,口4601万余,时隔450多年,户口还没有完全恢复。直到唐天宝十四年(755年)以后,户口才恢复到东汉后期的数字。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偶有经济恢复局面,如西晋初年、南朝刘宋元嘉时代、北魏太和时代,但经济恢复或限于局部地区,或者时间非常短暂。这种政治经济形势使得两汉初步发展的商业和货币经济,这时完全处于萎缩状态。

两汉之际,城市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已初具规模。当时,货币除大量的作为交易媒介外,官吏俸禄的一半以上以钱支付,其余一半给予谷物,农

群雄纷争
频繁更迭——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

民的口钱、算赋,全部以钱缴纳。人民每年戍边三日,服役一月,也可用钱代替。东汉末年,政府对于郡国的土地,除收纳部分谷物外,还课以每亩十钱的租税。但从魏晋至隋因为长期战乱分裂,财力消耗、人口散亡、灾疫严重、土地荒芜、生产凋敝、交通阻塞,钱币铸造既少且质量低劣,因而商业和货币经济完全衰落,以谷物和布帛等实物交换盛行。南朝虽然货币流通略有复苏,但仍以实物和货币在市面上相互流通。北朝太和以后钱币开始流行,但也是非常有限的。

这种经济状况,使得从曹魏开始,国家征收租税发生重大变化。除田租与两汉相同以农产品为主外,曹魏将两汉算赋和口钱以丁为单位征收货币,改为以户为单位征收绵绢的户调,同时徭役不再用钱代免。从此,不管以后封建王朝征收租税如何变化,但从曹魏开始的田租户调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实物为主的租税制,一直沿袭到唐代实施两税法才废止。北魏时连盐税也征收实物。南朝虽然租税收入中有部分货币,但远不如实物的比重占得多。此外,魏晋以来农民耕种地主和官府的土地,完全交纳实物地租。官吏俸禄由汉代的一半给货币,基本上改为全部给谷帛等实物,只有北齐官俸有三分之一是以钱支付的。小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的报酬,虽然种类繁多,也是以布、帛、米、粟、麦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支付。魏晋至隋代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家租税征收的变革,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个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最典型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在经济上广占良田,形成了庄园经济。士族庄园占有大量土地,拥有许多依附农民,却不向国家承担各种赋税和徭役,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兵役杂税的来源。同时,这种经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它是导致这一时期分裂割据

的经济基础。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寺院经济实力增强。它以宗教关系为纽带,通过神权和教义的力量进行维系。寺院占有许多劳动力,包括下层僧侣、僧祇户、佛图户等。寺院经济过度发展,广占田宅、侵夺百姓、与官府争夺劳动力和税收,使农民负担加重。但寺院经济的发展,为这个时期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东汉末年频繁的战乱,使黄河流域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流亡,经济衰落。而长江流域则相对稳定,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乱影响,加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带去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因而南方的经济大发展。北魏时颁行的三长制和均田制相辅相成,不分民族成分而分土定居,统一成为国家编户,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行均田制以后,北方民户大增,经济实力也不断加强,从而奠定了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